

中國、俄國和歐洲之間的知識交流

——18世紀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

柳若梅* 龐曉梅**

摘要 1725年成立的彼得堡科學院是彼得一世以建設俄國的科學為宗旨而成立的。成立之初，由國家出鉅資邀請當時歐洲最有成就的學者前往任職，成為俄國科學事業發展的重要轉捩點。它在成立後的第一個十年間，就培養出10位俄國科學家，為俄國科學的進一步探索奠定了人材基礎。彼得堡科學院與經由澳門來到北京的耶穌會士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通信。他們討論了中國語言、歷史、音樂、天文學、數學、醫學、自然史、植物、物理知識。彼得堡科學院還邀請北京耶穌會士擔任榮譽院士。由此，一方面耶穌會士在相關領域研究中國的成果得以同彼得堡科學院和歐洲學術界交流，另一方面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在通信中亦將歐洲、俄國的天文學、物理學知識進展傳給北京耶穌會士，使之運用於他們在清朝的研究和科學實踐活動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國、俄國、歐洲在科學文化知識上的交流與互動。

關鍵詞 彼得堡科學院；中國；北京耶穌會士；通信

歐洲啟蒙運動興起之時，也正是彼得一世試圖將俄國變成歐洲強國的起步之時。1698-1700年的巡歐過程中，彼得一世曾與德國啟蒙運動思想家萊布尼茨會面，兩者後來也保持著書信往來，萊布尼茨對科學和藝術的態度對彼得一世有重要影響。後來，萊布尼茨的弟子沃爾夫更是為彼得一世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議。1717年，彼得一世被推舉為法蘭西科學院成員，進一步推動了彼得一世在俄國創辦科學院的想法。1724年1月，俄國樞密院著手討論科學院創建問題，此後彼得一世簽署了俄國成

立科學與藝術研究院的命令，並由俄國宮廷御醫布留門特羅斯草擬了科學院章程。由俄羅斯國家出資¹，邀請歐洲最著名的學者來俄國工作，從事學術研究，編寫教材培養俄國人材，並將科學研究運用於俄國發展的實踐之中。1725年，彼得一世的繼任者——其妻子葉卡捷琳娜一世簽署了關於創辦科學院的法令，並任命布留門特羅斯為科學院主席。彼得堡科學院的首批院士共17人全部來自西歐，其中包括數學家 and 天文學家德利爾（Joseph-Nicolas de L'Isle, 1688-1768）、數學家格爾曼（Jakob Hermann, 1678-1733）、數學家尼古拉·伯努利（Nikolaus II. Bernoulli, 1695-1726）和丹尼爾·伯努力（Daniel Bernoulli, 1700-1782）、數學家歐拉（Leonhard Euler, 1707-1783）、物理學家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龐曉梅（Tatiana A. Pan），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研究員。

布林芬蓋爾（Georg Bernhard Bülfinger, 1693-1750）等。彼得堡科學院逐漸凝聚了一批歐洲優秀學者，並與巴黎、柏林、瑞典、里斯本、哥尼斯堡、圖盧茲等地的科學院以及同倫敦、哈勒、丹麥的學術團體保持密切的學術通信和往來，成為歐洲著名的學術中心。

中世紀以後至18世紀的千餘年間，教會一直是學術研究的主導力量。在18世紀，宗教界至少佔據了學術界的半壁江山，即使是世俗學者，也大都得益於教會的教育；一些宗教人士在學術界和文學界享有盛譽，如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中就有多人為教會學者；一些學者的研究與宗教密不可分，如彼得堡科學院院士拜耶爾早期的學位論文就是以耶穌受難前的最後一句話為研究主題的。耶穌會在教育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對歐洲文化的廣泛影響，在歐洲古典文化、哲學、神學、自然科學領域的建樹，使之成為歐洲重要的文化力量。為傳播基督教，耶穌會士前往美洲、印度、中國、日本等地。他們以自身的學術基礎接受這些地區各方面的信息並傳給歐洲，成為關於相關地區知識的最重要的傳播者，推動著歐洲學術文化的腳步。另一方面，及時獲取歐洲的學術進展，並將歐洲的學術成果應用於所在地區的傳教和文化交流，也歷來為在外傳播基督教的耶穌會士們所重視。中國是歐洲地理大發現之後較晚為歐洲所接近的國家。中國的古老文明引發了歐洲公眾的好奇和學術界濃厚的興趣，而北京耶穌會士進入清朝宮廷並主導清朝的天文和曆算，其學術研究和學術實踐活動深深吸引了歐洲學術界，形成了歐洲學術界與北京耶穌會士的密切關係。此外，彼得堡科學院的一些院士，原本就與耶穌會士保持著通信往來，比如，拜耶爾關注東方語言，曾與印度的耶穌會士通信；德利爾一直與從事天文學的耶穌會士保持通信等等。

對於歐洲來說，中國是一個遙遠、神秘和難以達到的國家。17-18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學者萊布尼茨在提到中國時說：“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於滙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歐洲’的中國。我認為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也許

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它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合乎理性的生活。”²正是出於這個目的，萊布尼茨本人與北京的許多耶穌會士如閔明我、利國安、白晉、洪若翰、杜德美、劉應等保持通信達70多封，這也說明了歐洲學術界對中國知識的渴望和需求，彼得堡科學院的院士們，自然也不例外。彼得堡科學院所藏信件及相關檔案資料顯示，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的耶穌會士通信起自18世紀30年代，截止至1774年，彼得堡科學院有12位院士與北京的耶穌會士（17位）通信，通信總數達145封。這些通信，既形成了俄羅斯與澳門的間接聯繫，也是經由澳門、以俄國為橋樑、溝通中歐文化和學術的一樁盛事。

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與北京的耶穌會士的學術通信涉及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漢語、中國歷史和文學

彼得堡科學院籌備成立之時，正是歐洲對世界其他語言非常感興趣的時期³。1726年，在深受萊布尼茨思想影響的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的推薦下，普魯士東方學家拜耶爾⁴受聘擔任彼得堡科學院古代史院士職位。早在1713年，19歲的拜耶爾就曾接觸到關於中國的資料而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自學漢語。1715至1717年，拜耶爾在柏林皇家圖書館讀到曾德昭的《大中國誌》以及其他中國藏書和手稿，使拜耶爾眼前的中國世界愈加豐富。1718年，拜耶爾發表了他第一篇關於漢語的文章《兩本介紹漢語的書》⁵。在決定前往彼得堡受聘為科學院院士時，他曾希望在俄國找到研究中國的新資料。來到俄國後，拜耶爾充分利用俄國因與清代中國直接接壤而獨享陸路往來通道的條件⁶，每逢商隊人員回國，常常向他們詢問關於中國的各式各樣的問題，留心收集有關中國的信息、資料，設想編寫出版一部漢語語法指南，再附上中國文學介紹和漢語詞表。在1729年2月27日召開的科學院例行會議上，拜耶爾提出編纂出版《中國語法》的想法，經討論確定該書完成後將出版1000冊。這一決

歷史研究

定馬上就得以實施，第二天這部預想中的書的第一頁小樣兒便得以付印。⁷1730年，拜耶爾這部《中國博覽》⁸得以問世。該書分為上下兩卷。在前言中作者總結此前歐洲積累的關於中國語言、文字、文學的信息；上卷則描述了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語法框架、漢字的書寫、印刷方式、中國人的辭令；下卷包括漢語—拉丁語的翻譯，其中一部分是由44個表格組成的、帶拉丁文解釋的漢語詞表、皇室封號和中國的官職稱謂，介紹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中國度量衡、中國計算時間的方法，還描述了中國的日蝕。這是一部集合了相關中國各類消息的著作，也是歐洲第一部專論漢語的書籍。《中國博覽》不僅是彼得堡科學院與清代語言交流的起點，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歐洲與清代中國的語言交流。該書問世後在歐洲學界反應強烈，其後的百餘年間一直受到歐洲的漢學家、語言學家的評論。書中全面地概述了當時歐洲對於漢語的認識和了解，反映了18世紀初歐洲語言學的總體水平以及研究、描述類似漢語這種鮮為人知的語言的角度。19世紀俄國漢學的奠基人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在其《漢語語法》⁹的前言中提到拜耶爾的這部著作時說：“拜耶爾的可敬之處就在於，他關於語言機制的概念雖不全面，但卻是相當正確的。”¹⁰

《中國博覽》也曾直接參與了清代中國與俄國之間的往來交流。雍正九年(1730)，在俄國新皇登基之際，清廷派內閣學士德新、侍讀學士巴延泰為使臣，率團攜帶禮物前往俄國慶賀俄國沙皇繼承皇位。¹¹1732年清朝使臣抵達俄都後得到俄國方面的熱情接待。清朝使臣在俄期間(俄曆1732年7月6日)在彼得堡科學院訪問近六個小時，參觀了科學院印刷廠、珍寶館和實驗室。拜耶爾作為科學院研究中國的院士接待了清朝使臣。他試著用漢語同他們交談，向清朝使團秘書福盧請教科學院所藏中國圖畫的寓意¹²，並將《中國博覽》贈給了中國使團。

拜耶爾的《中國博覽》得到當時俄國最高樞密院成員、俄國政界關鍵人物奧斯德爾曼¹³的讚賞。他稱讚拜耶爾的漢學研究，並允許拜耶爾進入他藏

有漢語書籍和收藏品的私人圖書館，並幫助拜耶爾和俄國科學院的幾位天文學家、歷史學家同北京的耶穌會士建立起了通信聯繫，並達成了互贈書籍和手稿抄本的約定¹⁴。拜耶爾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也促進了俄國學術界對中國語言的關注，而關於中國語言的問題是他們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1732年9月12日，在北京的耶穌會士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收到拜耶爾託俄國商隊帶給他們的信函和《中國博覽》後，在給拜耶爾的回信中介紹了漢語句法問題、中國人學寫漢字的方法、漢語的特點等¹⁵。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¹⁶的發現在歐洲引起轟動並成為學術熱點。拜耶爾非常希望能夠得到碑文，但北京的耶穌會士回答稱：“至於那座在西安附近發現的石碑上的中文文字，一方面它本身要求有人能翻譯，另一方面找到它的抄件也不容易”。雙方還討論了關於中國歷史、音樂等：“在羅馬(由最尊貴的主教傳聖澤先生，他不久前還在中國當傳教士)出版的、帶上漢字的《中國歷史年表》，我們不應當讓它誤導任何人。此書的作者企圖表明，中國的歷史並不悠久，能證明中國有過久遠的年代和許多古代帝王的不過是一些神話傳說而已。而且這一年代的系列還並不連貫，因此，有些中國帝王統治的時代仍然是不確定的。其實《聖經》中的神聖歷史中也不乏這種空隙，這正是人類應該去研究的地方。”¹⁷關於中國音樂，拜耶爾從這次通信中了解到，“中國音樂肯定有自己的規律，雖則這種規律讓敏感的歐洲人聽起來並不完全順耳”。¹⁸

拜耶爾收到這封回信後再次(1733年11月15日)給嚴嘉樂寫信¹⁹，請教中國詞典《字彙》中的‘聖’字以及‘西狩’一詞²⁰。嚴嘉樂在1734年7月23日給拜耶爾的回信中，回答了拜耶爾關於“西狩”的疑問²¹。嚴嘉樂還在信中附上了他從《資治通鑑》《通鑑綱目》《綱鑑補》《品字箋》中抄錄並做的註釋，這是他認為的“聖”字較好的解釋。拜耶爾在回覆嚴嘉樂的這封信中(1735年1月6日)認為，從景教碑文的第一行就可以看出，中國的景教碑文應該是從西徐亞文譯成中文的，要解釋景教碑文並不會太困難²²；根據《品字箋》

和《綱鑒補》解釋“聖”字很有啟發。拜耶爾在與宋君榮的通信中（1732年7月3日）也了解到耶穌會士在中國語言學習與研究方面的成績，北京耶穌會士與歐洲的學術溝通²³，以及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要編撰《拉漢詞典》的想法²⁴。1734年拜耶爾收到了巴多明寄來的《拉漢詞典》手稿²⁵。

《中國博覽》出版後，拜耶爾不滿足於書中所附的簡單詞表。早在1731夏天，拜耶爾已經從出使中國的薩瓦一拉古津斯基²⁶那裡借來北京耶穌會士巴多明編寫的漢拉詞典自己做出了抄本，還借來了《海篇》和《字彙》²⁷。後來他還利用奧斯捷爾曼私人藏書中的《字彙》《海篇》等中國字書，豐富了他的漢語拉丁語詞典的內容。在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中，1734年拜耶爾又收到了巴多明、沙如玉編的《拉漢詞典》抄本，這也成為拜耶爾漢拉詞典的重要參考資料，同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團員學生也為拜耶爾的詞典做了不少工作。1734年11月，拜耶爾在科學院例行會議上提出詞典的出版問題，得到與會者的認同。但問題卻出現在會議決定的實施階段：出版這部詞典需要刻出1萬多個漢字木版。這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詞典的出版只好擱置下來。拜耶爾的漢拉詞典手稿共26卷，在拜耶爾去世後存入科學院圖書館。在1779年科學院圖書館館長巴克梅斯捷爾編的科學院書稿善本目錄中，這套手稿遺失了兩卷，只剩下24卷²⁸，到20世紀初進入亞洲博物館的科學院圖書館時則只剩下了23卷，其第9、10、12卷闕如²⁹，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圖書館。

同彼得堡科學院的其他學者一樣，拜耶爾的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於科學院的學術出版物《彼得堡科學院通訊》上，其中體現拜耶爾關於中國語言的研究文章也反映了俄國學術界對清代中國語言的關注。1738年，拜耶爾發表了《關於中國的字典〈字彙〉》³⁰的長文，拜耶爾見過3個版本的《字彙》³¹，文中全面詳細地介紹《字彙》一書，包括漢字的書寫、漢字構成規律、漢語字音、漢字注音、漢字聲調、漢語詞義等內容。

宋君榮在1732年5月15日給德利爾的信中表

示，研究語言是他們活動的一部分，因此希望得到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們的著作和俄語語法，特別是帶有歐洲語言譯本的俄語語法。並表示他們願意為俄國編拉漢字典、拉滿字典、漢拉字典和滿拉字典。

滿語是清前期特別是正式場合使用的重要語言。當代滿學學者有言：“在清入關後的前百餘年，滿族人使用滿語，同時漸漸熟悉漢語。清朝皇帝恐滿族人忘去本族語言，於是強調滿語的重要性，強調‘國語騎射’（或說‘清文騎射’），凡錄用官員、考試、京察、入伍、承襲世職等，都以滿語為準；滿語水平高的優先錄用。……雖未規定漢族人必須學滿語，但漢族人為應科舉考試也必須學習滿語，考取庶吉士必須考滿語。”³² 拜耶爾在關注中國的同時，滿語不僅是其關注的目標和與北京耶穌會士通信的話題，還在1722至1733年間的科學院會議上宣讀了他對滿語的研究。這次發言以《關於滿文》為題於1738年發表於《科學院通訊》上³³。拜耶爾關於滿語和滿語文獻的文章是滿語首次在俄國出現的記錄，後來中國俘虜在莫斯科教授滿語以及俄國常駐北京的東正教使團成員的翻譯和研究，豐富了俄國對滿語、滿語文獻和滿族文化的瞭解。

以拜耶爾為中心的彼得堡科學院與清代中國之間的語言文化交流，為俄國積累了融入歐洲文化知識領域的資本，豐富了歐洲對中國語言的認識，也引領了18世紀俄國利用與中國相鄰的先天便利進行科學探索的思路。

二、天文學和地理³⁴

天文學是歐洲學術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哥白尼、伽利略等學術先驅在天文學領域的執著追求為歐洲近代學術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天文學也是彼得堡科學院創建之初就關注的一門科學。北京的耶穌會士入主欽天監，並以此為契機在清朝宮廷得以立足，這一事實為歐洲所知。向北京耶穌會士了解中國天文狀況和研究進展，對於歐洲天文學發展來說非常重要。在彼得堡科學院，除來自法國的“國

歷史研究

王的天文學家”德利爾之外，拜耶爾等在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中也提到天文學問題。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自早期的宋君榮到耶穌會在華末期的劉松齡，都留下了大量信件。宋君榮和劉松齡將其研究成果寄給彼得堡科學院並在其刊物上發表文章，形成了歐洲與中國的學術互動。

作為歐洲知名的天文學家，德利爾把北京耶穌會士當作遠在東方的“最大觀象臺”，渴望與他們建立聯繫。德利爾最先是與北京耶穌會士天文學家、擔任數學院掌院的戴進賢通信。在給戴進賢的信中，德利爾想了解北京耶穌會士進行天文觀測的工具和方法、從甚麼時候開始進行的，並介紹怎樣觀測能夠更加準確，還介紹了自己在彼得堡科學院天文臺進行觀測的方法。他給耶穌會士寄去了俄國樞密院秘書基利洛夫在彼得堡出版的北部亞洲地圖。德利爾說，這幅地圖在繪製時參考了北京耶穌會士的中國地區。

戴進賢給德利爾寄去需要轉往西班牙格拉瑪季克神父的信，還有自己的四年天文觀測的記錄。戴進賢在信中答應給德利爾寄去中國北方的地圖。當然，由於耶穌會士還沒有到過中國北方，所繪地圖不夠準確，為此圖上附有當地人和相鄰地區的人的可信的說法。1729年在巴黎出版北京耶穌會士的《天文觀測報告》，在歐洲天文學界引起轟動。但是，戴進賢向德利爾抱怨其中有很多錯誤和自相矛盾之處。德利爾在與嚴嘉樂的通信中，也涉及了這一觀測報告。嚴嘉樂認為，這一報告中有很多錯誤，特別是其中的北京平面圖謬誤較為嚴重。北京耶穌會士對蘇西埃神父的《天文觀測報告》中的錯訛非常惋惜，為此宋君榮向巴黎寄去了長達幾頁的勘誤表。戴進賢在與德利爾的信中談到天文觀測方法，特別是影響觀測準確性的因素，諸如確定觀測時間的準確性、望遠鏡的長度、觀測者視力情況、眼睛的疲勞度等。當時北京的耶穌會士還不知道透視望遠鏡，戴進賢請求講解這種望遠鏡的裝置。戴進賢準備把在北京做的所有天文觀測都轉給德利爾，說為德利爾效勞是他的榮幸。

宋君榮在1732年5月15日寫給德利爾的信中回

憶自離開巴黎後同德利爾的學術交往，表達了希望恢復這種聯繫的願望。從巴黎的來信中宋君榮了解到關於德利爾以及德利爾在俄國的新情況等很多新信息，甚至從巴黎的朋友處得知，德利爾擁有以前的北京耶穌會士繪製的中國地圖，很想知道這一地圖是怎樣寄來的。宋君榮曾將中國古人的天文學資料、中國天文學家的計算資料以及時間的計算資料等寄給巴黎出版者，但出版時錯訛極多，都屬出版錯誤，而不是作者的錯誤，出版者應予以訂正。宋君榮已將其中錯處訂正並做出長篇勘誤寄表，這個勘誤表如果在巴黎不能出版，他希望寄給德利爾，因為北京耶穌會士非常願意把天文觀測內容告知德利爾，也希望得到德利爾的觀測內容。宋君榮希望得到三角測量法的俄國地圖，或者是天文測量法。在1732年5月20日的信中，宋君榮神父還提到他在北京進行天文觀測的簡易裝置，將他在法國教堂所做的天文觀測結果寄給了德利爾，並在德利爾的幫助下，理清了彼得堡和北京的子午線差別。信中也談到了他所了解的德利爾的觀測。宋君榮表示，他與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孫璋和宋君榮正在討論用德利爾建議的方法進行月亮和行星的天文觀測問題。宋君榮提請德利爾關注新的北京天文學家耶穌會士孫璋，認為孫璋是很有希望的天文學者，同時孫璋也給德利爾寄去了自己在1733年底和1734年初在北京的法國修會天文臺所進行的月亮和行星觀測記錄，並說明了觀測所使用的方法和儀器。

1734年德利爾利用朗格前往中國之機再次給宋君榮、戴進賢和嚴嘉樂寫了信。在給宋君榮的信中，德利爾肯定了朗格和奧斯捷爾曼在發展彼得堡科學院和北京耶穌會士之間的通信的作用，認為現在這些通信已經是兩方面的信，一方面是科學院秘書的關於一般問題的信，一方面是科學院院士們關於學術問題的信。科學院寄出的出版物的交換，應當與院士們的個人寄書區分開。德利爾答應給他們寄俄國地圖，希望得到中國北方的地圖。他還談到，俄國向西伯利亞派出了考察隊，他的弟弟在考察中將負責天文觀測。德利爾請宋君榮在中國組織這樣的觀測，以便下一步得出比較性結論。他把自

己的天文觀測資料和歐洲天文學家的一些資料寄給宋君榮，並向宋君榮介紹了天文學領域的各種資料信息。他還給耶穌會士們寄去了溫度計，請求他們在中國進行地磁觀測，還寄去了俄國在北美地區考察繪製的地圖。德利爾請求給他一份耶穌會士到中國之前的中國古代天相總圖和天文觀測記錄，以便他們可以從中國古代的書中得到這些內容。這些資料是他確定以往天體情況及其多個世紀來的變化的必備資料。

在宋君榮給德利爾的信中（1736年12月31日），他介紹了1733年、1734年、1735年和1736年的天文觀測（後發表於《彼得堡科學院通訊》第五卷頁473-480），讚揚德利爾建議的工作方法。戴進賢、徐懋德和孫璋也打算將工作內容告訴德利爾。宋君榮希望北京耶穌會士未來能夠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保持來往。最後宋君榮希望了解俄國在地理學方面所做的工作。

徐懋德在1742年4月23日給德利爾寫信，介紹了1742年3月間在北京看到的慧星的情況，隨信附有標有星體及慧星運行路線的星體圖，這個圖是在北京以漢語出版的。

德利爾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一直持續到德利爾1747年離開彼得堡前往巴黎。德利爾離開彼得堡科學院之後，他與北京耶穌會士關於天文學問題的學術通信中止了一斷時間，原因是中俄往來發生中斷而沒有方便的機會寄信。另外，這段時間參加通信的幾個耶穌會士相繼去世（戴進賢、嚴嘉樂、徐懋德）。彼得堡科學院開始有第一批俄國天文學家科學院院士：尼基塔、波波夫和斯捷潘魯莫夫斯基，北京耶穌會士天文學家也出現了新人：劉松齡和方守義，隨之而來的是新的學術聯繫的建立。

拜耶爾與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也談及天文學。從戴進賢、徐懋德、嚴嘉樂1732年9月12日寫給拜耶爾的信中可知，拜耶爾把德國天文學家基爾赫的天文觀測結果寄往中國，而這三位耶穌會士則隨信將中國的皇曆（雍正在位11年間的）贈送給了拜耶爾。1734年嚴嘉樂在給拜耶爾的信中提到，德利爾希望得到嚴嘉樂的天平動的觀察圖像。嚴嘉樂說，

相關觀測已經完成，待完成整理加工後將公諸於世。1734年10月30日，拜耶爾將自己用歐洲方式繪製的星象圖寄給了戴進賢、徐懋德和嚴嘉樂，此外還有拜耶爾按衛方濟的《數學和物理觀測》一書中的中國的星辰、星座的名錄所做的星象圖說明，並將戴進賢的信和個人的天文觀測報告轉給西班牙天文學家格拉瑪季克神父，這令戴進賢和其他耶穌會士非常高興。

戴進賢和徐懋德在1734年8月4日給拜耶爾的長信中，詳細介紹了中國人的年和月的時間週期計算方法，中國日曆的確定等。他們認為這些方法有可能是中國人從相鄰國家（波斯、印度等國）的民族那裡引進的。接著他們詳細地回答了拜耶爾關於耶穌降生31年的日蝕問題。最後告訴拜耶爾託俄國信使帶去了早期北京耶穌會士的中文著作和在北京出版著作的目錄。

18世紀下半期，斯洛文尼亞耶穌會士劉松齡開始擔任清朝的欽天監監正。1754年劉松齡委託隨第六批俄國商隊到北京的科學院醫生葉拉契奇，向科學院院士寄信，告知收到寄給他的書和其他資料，並表示可以給科學院寄一份1717-1753年北京天文觀測手稿，不過，由於這份手稿出版時應寫明獻給葡萄牙國王，所以須經葡萄牙國王同意才能給彼得堡寄出。另外，劉松齡還告知，已成功確定北京和彼得堡子午線之差是5小時44分16秒。

在1764年5月17日和24日的科學院大會上宣讀了科學院院士米勒和科學院主席拉祖莫夫斯基收到的劉松齡和蔣友仁的信，隨信還附有耶穌會士方守義通過日晷儀進行的金星的天文觀測。會議決議規定這些信件交由拉祖莫夫斯基教授處理。1766年3月15日，拉祖莫夫斯基通過前往北京的信使克羅波多夫向方守義回信。拉氏在信中說方守義的觀測明確體現了觀測者的能力和準確度。這些觀測與西伯利亞和歐洲所做的觀測一致，一些重要問題都由此得到解決。拉祖莫夫斯基還向北京耶穌會士介紹了彼得堡的天文學家準備在1769年觀測太陽圓盤下行星走向所採用的方法。這些觀測能夠更準確地確定太陽視差。最後拉氏告訴方守義光學領域最近的

歷史研究

重要的發現：關於Dolland研製的雙筒望遠鏡的視筒，關於哈里森發明的測量長度和海上位置的儀器，關於吐溫發明的測量海的深度的儀器，關於西歐學術界因幾位著名數學家的離世而造成的損失。還給方守義寄來了歐拉和克列羅特關於慧星的書。

1774年8月18日科學院才收到以耶穌會士金濟時的名義給拉祖莫夫斯基的回信，信上所標的寫信日期是1772年5月5日，金濟時給拉氏寄來了他和方守義、Буржуа在1772年初所做的觀測，還有方守義對在1769年8月仍可見的慧星所做的觀測。金濟時認為金星在1769年離開太陽圓盤，方守義也觀測到這是因為發生了某種混亂，所以這些觀測並不可信。

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關於天文學問題的進一步通信在劉松齡（1774）、方守義（1780）和金濟時（1781）去世後停止。

三、自然學、醫學和物理

1734年，俄國商務代表朗格將再次前往北京。彼得堡科學院秘書得知此事後，建議院士們準備與北京耶穌會士通信。對此感興趣的科學院院士，除拜耶爾和德利爾外，還有阿曼³⁵院士和久維爾努阿³⁶院士。他們提出自己感興趣的關於自然史和醫學的問題，希望得到北京耶穌會士的答覆。阿曼院士的問題涉及大黃、茶樹和煙草以及醫學：1. 中國人從哪裡得到的大黃，怎樣加工、在醫學上用於甚麼目的。2. 大黃自然生長在哪些地區，有甚麼醫學特性、用於治療甚麼病。3. 中國人和日本人用來塗抹病體並加熱的膏藥取自甚麼植物，能治甚麼病，療效如何。4. 茶樹是甚麼樣的一種植物，紅茶和綠茶之間有甚麼區別，是不是取自同一棵樹，如果是的話，怎樣加工。5. 中國人抽的煙袋所用的那種含尼古丁植物的、或者美洲煙草的葉子是否需要切得很碎。6. 描述生長在中國南部的烏柏樹的外觀。7. 中國人用根髓作人工花的植物。8. 以上所有植物的新鮮種子、樹葉樣例，葉間陰乾的紙，中國自然生長的樹的葉子、花園培植的樹的葉子，特別是那些有藥用價值的。9. 自然界有藥用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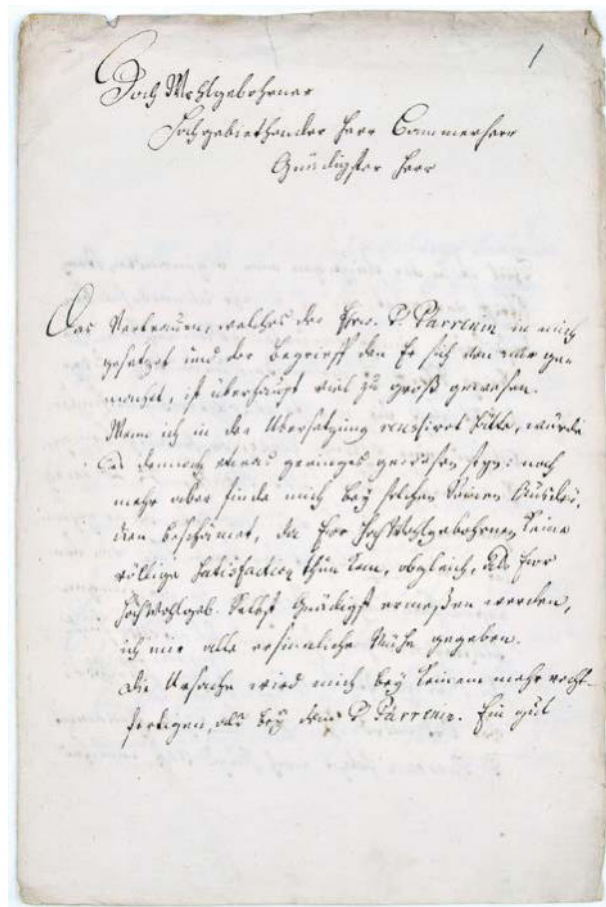


圖1·巴耶爾關於巴多明工作的報告1的檔案編號為：ф. 150 оп. 1. Д. 17. Л. 55.

值的所有物品。10. 礦物、金屬、顏料等的加工和使用。11. 毒物及其特性。12. 描述並畫出動物、鳥類、魚類。13. 中國人的食物、生活方式、地方性和流行性疾病。14. 天花疫苗（時間、加工、飲食禁忌）。中國何時首次發現的天花。疫苗是甚麼時間研製的，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還是從外國人那裡學來的。15. 性病何時開始困擾中國人，有沒有治這種病的方法。

久維爾努阿院士的問題涉及中國解剖學、生理學和醫學等方面。中國解剖學方面：1. 是否解剖人的遺體，從甚麼時候開始、甚麼人、用甚麼方法、帶著甚麼目的解剖。關於人體各部位及其功能、關於血液和其他體液的迴圈。關於女性月經，甚麼年齡開始和結束，持續多少天；關於生產時間，關於新生兒肚臍的包紮。2. 中國人是否運用外科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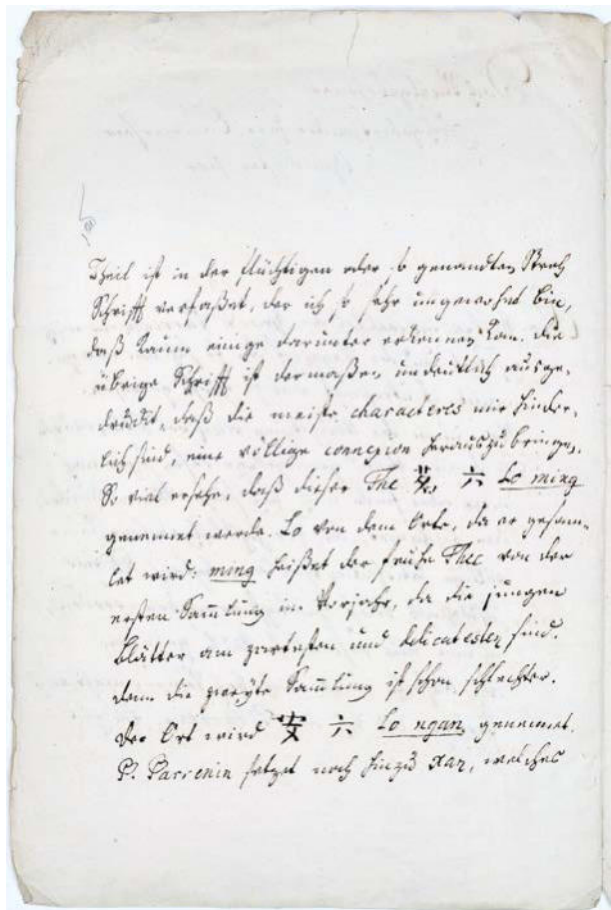


圖2·巴耶爾關於巴多明工作的報告1背面的檔案編號為：φ. 150 on. 1. Д. 17. Л. 550б.

甚麼樣的外科學，外科學書籍的作者和作家，外科用具，外科手術。中國人的外科學成就。是否使用切開靜脈和換血，用於治療甚麼病。3. 關於動物、其系統各類、特點、利用、外部和內部結構等。中國生理學和醫學方面：1. 中國人的生命壽命。2. 中國人的飲食，小孩、壯年和老人的健康飲食。3. 有哪些遺傳病和非遺傳病，是否常見。4. 是否有專門的醫學手段（外用的和內用的）。5. 是否像歐洲的新生兒那樣，剛出生時頭骨間有窟窿，這個窟窿多久才能長實。6. 新生兒能不能放在水裡，用甚麼方法游泳。死者的墓穴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7. 中國人腸道是否長寄生蟲，如果生，在身體上有甚麼反應，長寄生蟲的原因。遺體上是否有寄生蟲生長。

在1734年10月28日的科學院大會上兩位院士的這些問題得到大會的讚揚。久維爾努阿院士強

調，很可能北京的神父或中國公民不搞生理學，所以他只是提出了最一般的問題。

1737年3月21日，北京耶穌會士巴多明寫信援引《黃帝內經》和身邊的基督徒中醫的看法，以長篇筆記的方式回答了這些問題（性病的問題回答得最全面），並通過朗格將《黃帝內經》等中國書籍帶給了彼得堡的院士們。巴多明介紹，性病在中國由來已久，在耶穌降生前200年出版的中國書中就有相關藥方，接著介紹了性病的感染方式、外部表現和治療方法，並列舉出15種中國藥方。巴多明還提到，在中國南方省份，中國人已經會在火上製作水銀切片，當然製作秘方只有幾個家庭掌握，所以價值昂貴。中國還有一種治療性病的有效方法，被稱為蟾蜍酒，將蟾蜍放入沸騰的酒中製成，被中國醫生推薦為治療性病最有效的方法。

在1737年6月10日的信中，巴多明神父回答了阿曼教授提出的與中國人天花病等相關的問題，並建議久維爾努阿教授讀讀北京耶穌會士在巴黎的期刊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 上發表的相關文章，其中有久維爾努阿教授提出的問題的答案。

久維爾努阿院士在1739年12月9日給巴多明的回信中稱讚他把第阿尼斯的《解剖學》譯成滿語介紹給中國人，並認為應當出版第二版。如果巴多明同意，久維爾努阿願意在彼得堡為這部書做插圖。久維爾努阿又向巴多明提出了一些問題，如關於憂鬱症、痔瘡、結石病、肺病、痛風病等病症的治療方法。另外，他還問到，為甚麼中國人喝茶時不加糖，中國人用甚麼催眠方法、怎樣的劑量，中國是否有溫泉和冰泉等。遺憾的是，巴多明於1740年辭世，沒能回答這些問題。

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的在自然學方面的學術往來是在植物學領域。早在1729年，薩瓦使團從中國歸來後，拜耶爾就從彼得堡給當時在莫斯科的哥德巴赫寫信談到聽說使團從北京帶回了草木的圖片。在科學院同北京耶穌會士通信後，雙方都希望在交換圖書的同時交換植物種子，所以幾乎每次發出的商隊和信使都帶回植物種子包裹。這些中國植物的種子，被播種在科學院的植物園裡，成熟後就

歷史研究

得到研究和確定。植物學院士阿曼在1739年5月31日筆記中記載，種下了中國植物。院士的中國植物種植筆記同歐洲和美洲的64種植物種子一起，隨久維爾努阿給巴多明的信寄給了北京的耶穌會士。格梅林³⁷院士甚至在離開俄國後（1748年）繼續從圖賓根往彼得堡寄植物種子，以便科學院將這些種子寄給北京耶穌會士。

1755年，耶穌會士湯執中在格梅林和克拉舍寧尼科夫³⁸的信後，回信寄來植物種子，還特別附上長達44頁的關於這些植物的生長環境要求、藥用方式以及日常養護注意事項。信中談到的植物達500多種，其名稱用漢語的拉丁文拼寫記在紙邊，除植物外，還有動物、鳥類、昆蟲的名稱。筆記最後湯執中介紹了中國的葡萄、白葡萄酒和專門的配方。最後列舉了北京希望獲得的種子清單（共51種），並提議怎樣從彼得堡寄出塊根和蔥頭才能確保商隊長途行進時不變質損壞。格梅林於1748年去世、克拉舍寧尼科夫於1755年去世，雙方未能達成交流，不過，目前科學院檔案館藏有湯執中的回信的俄文譯文（部分翻譯），說明當時科學院還是對湯執中回信的內容有所瞭解。

1756年10月12日格賓什特列依特³⁹代替格梅林和克拉舍寧尼科夫給湯執中寫了回信，並隨信帶去54種植物的種子。與格賓什特列伊特同時給北京耶穌會士寫信的還有蓋爾列伊德⁴⁰院士。信件送達北京之後，湯執中已離世，楊自新於1757年10月9日代為回覆了來信並按來信請求寄出了12種中國植物的種子。信中說，由於當時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在植物學方面都不在行，所以無法為格氏和蓋氏寄送所要求的全種子。彼得堡與北京關於中國植物的通信暫時中斷。1760年耶穌會自然研究學者韓國英來到北京，並在1766年2月17日科學院決議公佈被推舉為彼得堡科學院榮譽院士後，彼得堡科學院重又開始與北京耶穌會士關於植物學的大量學術通信。1772年4月29日韓國英向科學院寄出其《北京郊區的菜園》（*Essai sur la longue vie des hommes dans l'antiquité*）一書，1773年10月21日寄出了《蘑菇》（*Champignon Mokou-sin*），1774年寄出了《中國園林》（*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1775年9月10日寄出了《蘑菇的養植》（*Notice sur la Culture des Champignons*），1777年10月10日寄出了《傘菌》（*Des Agarics*）⁴¹。

韓國英在信中說，他準備撰寫中國植物學歷史，翻譯中國書《六藝》，並將譯本獻給女皇，以感謝女皇對俄國耶穌會的愛護。⁴²在向彼得堡科學院發出《傘菌》一文時，韓國英說這種植物中國人人皆知，認為它能救命。“科學院的希望就是我的原則”，他在回覆科學院秘書的信時說。所以他在編撰這些書：1. 中國的植物學史；2. 中國關於植物的最早的書；3. 中國植物學中最有價值的資訊。但厄運來襲，天主教在北京遭到驅逐，耶穌會士抓捕。韓國英與彼得堡科學院的通信就此終止。

彼得堡科學院與北京耶穌會士關於植物問題的交流還有一個障礙，就是隨俄國商隊寄送的種子和鱗莖的包裹不總是能到達目的地，因為商隊走得很慢，有時甚至經年耽擱在邊界地帶，時間太久鱗莖腐爛，種子也放陳了。根據1753年3月27日克拉舍寧尼科夫院士的說法，科學院不再讓商隊轉寄植物種子和鱗莖的包裹，而改以通過信使轉寄，因為信使一般在路途上只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在18世紀，物理學是天文學觀測和研究不可或缺的知識。在1753年俄國從彼得堡向中國派出第六批商隊出發之前，科學院主席拉祖莫夫斯基建議院士們準備給北京的耶穌會士寫信，里赫曼⁴³院士和克拉特岑什坦因⁴⁴院士對此很感興趣。里赫曼的信的主題是介紹他所發明的測定自然電力的裝置，後來里赫曼完善了這一裝置，使之真正可以測定自然電力。里赫曼將對該裝置的完善意見寫給北京的神父們，並附了四張圖。⁴⁵在信的最後，里赫曼希望了解他關於北京的地磁觀測的資訊，關於磁鍼的偏角和傾角。此外，里赫曼轉達了天文學院士波波夫的名義的話，請耶穌會士寄來與堪察加和西伯利亞的觀測相一致的木星行星食變的觀測⁴⁶。在這封信發出之前，里赫曼曾於1753年4月19日的科學院大會上做相關報告。該信由葉拉契奇帶往北京。信發出3個月後，里赫曼在進行新裝置實驗時被閃電擊中去世（1753年7月26日）。克朗特岑什坦因院士在1753年4月12日所寫信中，介紹了

電研究領域的新成就，特別是用於治療某些疾病。他還介紹了自己發明的醫用電療的儀器。另外，克氏將自己對北冰洋磁鍼偏角和傾角的觀測、1748年天文學家勃拉德列伊借助“格里高里筒”進行的觀測告訴了耶穌會士，並向耶穌會士介紹了“格里高里筒”。兩人的信在1756年俄國商隊抵達時交給了北京的耶穌會士。宋君榮回信先告訴兩位院士，他對於他們的專業領域很不熟悉，但還是願意談一談他們關於電的規律、電的應用、磁鍼的偏角和傾角的看法。在北京的神父們看來，里氏和克氏是最著名的物理學和數學學者。在宋君榮的堅持下，錢德明和蔣友仁開始按彼得堡學者提供的方法進行實驗，取得了一些成果。至於電的實驗，對於中國名流和學者來說還為時尚早，因為實驗不夠安全，有可能對我們有損害。至於磁，宋君榮認為，中國人自基督降生前2670年起就知道使用磁了解世界，在耶穌降生前1500年時就知道磁鍼的偏角和傾角，但這些在中國古代的書中描述得混亂、不清晰。最後宋君榮說，他和蔣友仁將自己的天文觀測寄給了科學院，蔣友仁還寄出了中國典籍《書經》的拉丁文譯本（帶有表格和附錄）。錢德明寄出了自己對於擺的長度和磁鍼偏角、傾角的觀測。這封回信抵達彼得堡時里赫曼已不在世，克氏也從彼得堡去了哥本哈根。所以科學院主席委託采伊格爾院士回信（根據1756年12月20日記錄）。采伊格爾在信中感謝湯執中寄來他們的觀測，感謝他們關於擺的長度的試測以及磁鍼的偏角、傾角和電的問題等的試測。同進，他建議湯執中試測磁鍼時做些完善工作。

1758年科學院收到從北京歸來的信使帶回的給采伊格爾教授的回信（見1758年8月17日記錄），與物理相關的問題終止於此，因為1760年湯執中去世了，當時北京耶穌會士中沒有合適的關於物理問題的后繼者。

餘論

彼得堡科學院是彼得一世以建設俄國的科學為宗旨而成立的。成立之初，由國家出鉅資邀請當時歐洲最有成就的學者前往任職，是為俄國科學事業發展的

重要轉捩點。在成立後的第一個十年間就培養出了10位俄國科學家，為俄國科學的進一步探索奠定了人材基礎。彼得堡科學院與經由澳門來到北京的耶穌會士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通信，其中所討論的中國語言、歷史、音樂、天文學、數學、醫學、自然史、植物、物理知識，以及彼得堡科學院邀請北京耶穌會士擔任榮譽院士，將其在相關領域研究中國的成果與彼得堡科學院交流，使這些知識和成果參與了俄國科學事業發展最初階段的探索和研究，為俄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養分。由於是沙皇親自主持創建，由於首批院士全部來自歐洲重要科學機構，再加上俄國遼闊的地域為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空間和內容，彼得堡科學院從成立起，就是歐洲備受矚目的學術機構。俄國定期向清朝派出使節、信使、商隊，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與北京耶穌會士之間的通信、受聘於彼得堡科學院院士的北京耶穌會士的研究成果，比較及時地、源源不斷地送往俄國，其傳播範圍卻不僅限於俄國，而是經由俄國很快為歐洲學術界所了解，充實了歐洲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北京耶穌會士在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的通信中，將中國語言、歷史、文學與歐洲學術界的興趣相融合，拜耶爾院士利用往來俄中的商人帶回的相關資訊為基礎撰寫出歐洲第一部漢語語法，使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得以在歐洲學術界廣為傳播。北京耶穌會士在與彼得堡科學院院士的通信中將中國皇曆、《黃帝內經》《書經》等中國典籍及其譯本帶往俄國，推動了俄國和歐洲的學術界中國典籍和相關知識的了解；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在通信中將歐洲、俄國的天文學最新進展、物理學知識進展傳給北京耶穌會士，使之運用於他們在清朝的研究和科學實踐活動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國、俄國、歐洲在科學文化知識上的互動。**RC**

註釋：

- 1 彼得一世為科學院規劃了充足的經費預算，認為來俄國工作的院士應當得到相應的回報——每年25000盧布。
- 2 《萊布尼茨致讀者》，萊布尼茨：《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1。

歷史研究

- 3 地理大發現和16-17世紀的旅行開闊了人們的語言視野，而歐洲大陸上逐漸形成的部族、民族和新的書面標準語，印刷術、教育、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使學術界對語言的興趣日益濃厚。
- 4 戈特利布·吉格弗利德·拜耶爾（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普魯士學者，生於哥尼斯堡（今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17世紀歐洲歷史學家、哲學家、考古學家和東方語言學家，通曉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科普特語以及敘利亞語、阿拉伯語、漢語等多種東方語言。
- 5 Praeceptionum de Lingua Sinica duo Libri, Regiomonti, 1718.
- 6 1728年《中俄恰克圖條約》規定俄國定期向中國派出國家商隊。
- 7 С.К.Булич,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1. (18 в. — 1825 г.).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вместо вступления, «Введения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Б. Дельбрюка.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Меркушева. 1904. Стр. 369.
- 8 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 SPb.: Acad. Petrop. 1730. N. 1-2.
- 9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 1835.
- 10 轉引自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90, стр.81.
- 11 在中俄磋商《恰克圖條約》之時，清朝得知俄國皇位更替，遂於雍正七年（1729）行文至俄樞密院告知派使臣前往祝賀俄國新皇彼得二世登基，但清朝使團未入俄境之前彼得二世即已因病去世，俄方有意將此事拖延宣佈。得知此情後以祝賀彼得二世登基的名義派出的清朝使團只好改為祝賀俄國新皇安娜登基。德新和巴延泰帶領使團於俄曆1732年4月抵莫斯科近郊，4月27日抵彼得堡，4月28日在彼得堡參加安娜女皇加冕儀式。關於此次清使訪俄，可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頁541-543、545-562；[俄]尼古拉·班蒂什卡姆斯基編著：《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1619-1792）》，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29-232；B.W.Maggs著、李約翰譯：《十八世紀俄國文學中的中國》，成文出版社（臺灣）1977年，頁67-76；俄國當時的報刊上也發表了此次中國使團訪俄的情形。
- 12 嚴嘉樂著、叢林和李梅譯：《中國來信》，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136頁。
- 13 奧斯德爾曼（德文名 Heinrich Johann Friedrich Ostermann, 來到俄國後更名為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Остерман, 1687-1747），彼得一世的重臣，1720-1730年間俄國外交政策的實際決策者。
- 14 俄國科學院的院士們與生活在北京的耶穌會士的通信，由拜耶爾而始，一直持續了50年。同北京耶穌會士的通信，不僅為俄國科學院的院士們提供了關於中國的可靠的信息來源和學術觀點，大大地開闊了他們的學術視野，為他們各自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同時他們同北京的三個耶穌會（法國耶穌會、意大利耶穌會和葡萄牙耶穌會）交換的書籍和手稿抄本，還豐富了俄國科學院圖書館的資料，使俄國的學術界能夠及時把握當時漢學研究的發展狀況，為俄國漢學的建立邁出了有效的第一步。
- 15 這次通信中關於漢語的內容如下：“中文的句法是無法從詞典中學到的，尤其是從那些傳入歐洲的一些手抄本詞典。詞典《正字通》是一本很有水平的書，但它對“聖”字的解釋甚為簡略，既不足以涵括這個漢字的意義，也不能滿足歐洲人的求知慾。這個漢字的崇高含義必須到中國出版的書中去找。中國人學寫漢字的方法很適當：把一張透明的紙蒙在寫得很漂亮的影格兒上，用毛筆照著影格兒上的字描。這樣一直練到手學會協調地寫出漢字的各個部分為止。印刷的書籍中漢字的形態在手寫時幾乎是不必理會的，這同我們的印刷體字母和手寫體字母差不多。不過歐洲人應該知道，中國的漢字絕不能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種語言的字母相提並論。世界上其他語言的字母只是發音的符號，而漢字卻不是發音的符號，而是思想、事物和活動的代表，或者說是象形的符號，對於這類符號應該適用揚比喬斯對埃及學家們講的原則：‘抓住它的意義，不必理睬它的語音形態。’因為具有相同意義的同樣漢字，朝鮮人的讀法就（同中國人）不同，日本人的讀法也不同，印度支那人又不同。在中國內部，不同民族的人讀法也不同。漢字的結構、分析、意義、和諧、結合和使用，以及漢字的言簡意賅和內在的力量，這些學問不僅中國的學子們應該學，歐洲的學者尤其應該儘量多學。這種語文是如此之高雅，它就像浩瀚的大海，絕非涓涓溪流所能汲盡。”引自嚴嘉樂著、叢林和李梅譯：《中國來信》，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122-123。
- 16 《大秦景流行中國碑》發現於明代天啟三年（1625），當年耶穌會士金尼閣便譯成了拉丁文，後由曾德昭在中國學者幫助下完整地譯成了葡萄牙文（也有一說認為葡萄牙文譯本的譯者是羅雅谷），1631年在羅馬出版了由葡文本轉譯的意大利文本。1636年德國耶穌會士基歇爾翻譯發表了拉丁文本。（詳見耿昇：《外國學者對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碑的研究》，載《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頁56-64。）到拜耶爾的時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歐洲已不是新聞，可以推想拜耶爾讀過碑文的譯文，由於他對漢語感興趣，所以希望得到漢語原文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
- 17 嚴嘉樂著、叢林和李梅譯：《中國來信》，頁123-124。
- 18 嚴嘉樂著、叢林和李梅譯：《中國來信》，頁123。
- 19 拜耶爾給三人各回覆了一封信，並於11月5日給巴多明、11月18日給宋君榮各寫了一封信。這些信於1734年由俄國使華商隊帶往北京。
- 20 見《中國來信》頁126-127：“在中國詞典《字彙》中找到的漢字‘聖’我已寄給我的朋友巴多明神父。我17年前在柏林時就在中國詞典《正字通》裡發現過這個漢字。這兩本詞典上的解釋我都抄錄了下來，並譯成拉丁文……這兩本詞典裡對‘聖’字的歷史變遷作過許多解釋，還提到光武帝對這個漢字下的詔書。至於‘西狩’這個詞（“狩”在巴多明神父的詞典中沒有加以解釋）的事，您在來信中只是挑起了我的好奇心，並沒有能滿足它。”
- 21 拜耶爾關於“西狩”的疑問是：“這兩字組成一個詞究竟有

何意？這恐怕是一種比較困難的狩獵吧。”嚴嘉樂回信中說：“這種冬季的狩獵（‘狩’）之所以稱為西部的‘西’，只不過是因為進行這種狩獵的地方是在魯國的西部罷了。”見前引《中國來信》頁129。關於景教碑文，嚴嘉樂在回信中說：“關於碑文中的言語解釋，無論是印刷的（我只有這一版本），還是手抄的（我現在沒有時間製作抄件）都沒有用……因為，正如我兩年前業已指出的，這篇解釋本身也需要解釋。把這篇文章設法譯出來並不難，實際上也有人譯過，可是要譯得正確和準確卻是極為困難的，因為這篇碑文是如此的古雅、崇高和深邃，在中國也是無與倫比的。”見《中國來信》頁129-130。

- 22 作為教會史家的拜耶爾（其大受稱讚的學位論文便是關於耶穌刑前的一句話）同時有著豐富的東方古代語言知識，曾致力於西徐亞人研究（在彼得堡時發表過《西徐亞人的原始居所》《西徐亞人時代就是希羅多德時代》《論古代西徐亞人》等文章）（見柳若梅等著：《溝通中俄文化的橋樑——俄羅斯漢學史上的院士漢學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26頁），因而認為有西徐亞文來源的景教碑文的解讀並非難事。
- 23 “在廣州的馬若瑟先生給最聖明的富爾蒙特先生寄去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名為《中國語言誌略》。他還往巴黎寄去了不少關於中國的材料，這些材料肯定會受到學習漢語的學生的歡迎的。”見《中國來信》頁143。
- 24 “法國的神父們考慮要編撰《拉丁文——漢文詞典》。宣導編寫這部書的首推巴多明神父……這部詞典詞條數量很大……關於編撰這本書的事已和最聖明的朗格先生談過。”見《中國來信》頁145。
- 25 嚴嘉樂著、叢林和李梅譯：《中國來信》，頁201。
- 26 薩瓦一拉古津斯基（Савв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 Рагузинский），本是拉古紮人（今塞爾維亞杜布羅夫尼克市），1702年來到俄國，後獲得伯爵封號，並成為俄國對外貿易的重要人物，中俄《恰克圖條約》談判的俄國使臣。
- 27 見 Knud Lundbek,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漢學先驅拜耶爾》)，Curon Press, 1986，該書已由北京語言大學王麗虹完成中譯並即將出版。
- 28 Бакмейстер, Опыт о библиотеки и кабинете редкостей и истории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перев Васильев Костыговым. СПб. 1779, стр. 58.
- 29 С.К.Булич,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1. (18 в.—1825 г.).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вместо вступления, «Введения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Б. Дельбрюка.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Меркушева. 1904. стр. 370.
- 30 De lexico sinico Cu gvey //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 Peropolitanae. Ad Annos 1732-1733. SPb. 1738. T.6. pp. 339-364.
- 31 拜耶爾提到他看過3個版本的《字彙》。這裡我們可以推斷這3個版本的《字彙》來源：薩瓦一拉古津斯基從中國

帶回的一種，與巴多明的通信時巴多明送給他的一種，在奧斯捷爾曼個人藏書中用到的一種。

- 32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958-959。
- 33 De litteratura mangiurica //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 Peropolitanae. Ad Annos 1732-1733. SPb. 1738. T.6. pp. 325-338.
- 34 關於彼得堡科學院院士與北京耶穌會士關於天文學、地理、自然、醫學、物理的通信，主要參考了俄羅斯前輩學者沙塔洛夫整理的檔案文獻。詳見Т. А. Пан, О. В.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西歐和俄國漢學史檔案資料》)。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Воронеж. 2004.
- 35 阿曼（Johann Amman, 1707-1740），植物學家、醫生。原為倫敦皇家學會成員，1733年被聘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 36 久維爾努阿（Duvernoy Johann Georg, 1691-1759），動物學家，1725年被聘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1741年離開彼得堡。
- 37 格梅林（Johann Georg Gmelin, 1709-1755），德國自然科學家，1727年來到彼得堡，1730年起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 38 克拉舍寧科夫（С. П.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1711-1755），格梅林的學生，俄國第一位自然史和植物學教授，1750年成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並擔任科學院附屬大學校長。其著作《堪察加》於1756年出版。
- 39 格賓什特列依特（Johann Christian Hebenstreit, 1720-1795），彼得堡科學院自然史院士，1749年來到彼得堡。
- 40 蓋爾列伊德（Joseph Gottlieb Kölreuter, 1733-1806），德國植物學家，1756-1761年為彼得堡科學院植物學副教授。
- 41 韓國英1772、1773、1775、1777年的筆記保存完好，1774年的筆記不詳。1773年的筆記發表於《科學院通訊》第19卷，1775年的筆記有帕拉斯院士的評論，該評論是1777年7月3日科學院大會上帕拉斯院士的報告。
- 42 這裡韓國英指的是葉卡捷琳娜二世針對羅馬教皇克萊蒙十四世取締耶穌會而發出的關於保留俄國的耶穌會的沙皇令。
- 43 里赫曼（1711-1753），愛沙尼亞物理學家，1741年起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 44 克拉特岑什坦因（Christian Gottlieb Kratzenstein, 1723-1795），1748年由歐拉推薦來到彼得堡科學院任院士，1754年離開彼得堡。
- 45 四圖已不存，但以里赫曼發表在《科學院通訊》第14卷和《科學院新通訊》第4卷上的文章所附圖表為基礎能夠恢復。
- 46 《科學院新通訊》第3卷發表了克拉西爾尼科夫的文章“Observationes astronomicae eclipsium Jovis, durante expeditionis Kamtatzkiensi in diversae Sibiriae locis habitae”，引自Т. А. Пан, О. И. Шатало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Западно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4. стр. 75."